

规划理论的实践响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文教区规划的历史考察

The Practical Response of Planning Theory: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lanning of Beij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李浩 | LI Hao 王晨 | WANG Chen

中图分类号: TU98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3)04-0032-08 DOI: 10.12285/jzs.20230720006

摘要: 文教区规划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之城市功能分区思想的产物,其建设情况反映出社会实践对规划理论的响应逻辑。在广泛查阅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文教区规划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分析了以1954年国家计委审查意见为标志的有关北京文教区规划的争论及其原委,进而以文教区规划为切入点阐述了规划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响应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 城市规划史、规划理论、首都北京、文教区、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Abstract: The planning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is the product of the urban functional zoning thought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theory, and its construction reflects the response logic of social practice to the planning theory.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archiv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planning of Beij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and the original cause of the planning of Beij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marked by the review opinions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in 1954, and then expounds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lanning of Beij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Planning theory, Capital Beij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The first urban master plan

作者:

李浩,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晨,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 521780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 19ZDA014); 北京建筑大学培育项目专项资金资助(编号: X23033); 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编号: PG2023013)。

录用日期: 2023-05

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持续性分离是国际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在于立足具体的规划实践案例,实证性、交互式地探讨规划理论与建设实践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城市功能分区是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一个标志性的思想理念,而文教区作为城市功能分区的一种类型,正是这一规划思想的产物,且具有易于理解和贯彻执行等特点,是开展规划理论与实践交互式研究的一个适宜对象。就文教区规划而言,北京的相关规划实践不仅起步最早,对全国其他城市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而且还备受瞩目——1954年成为

国家计委对北京首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四点不同意见之一,此后又一度受到公开批判。那么,北京的文教区规划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因何会成为首版北京总规的突出问题并受到批判?其后续发展情况如何?更进一步而言,北京文教区规划规划的发展演变对于规划理论与实践响应机制的认识有何启迪?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值得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文教区规划进行学术层面的历史考察。从北京城市规划史的相关研究而言,尽管部分研究中对文教区规划问题有所提及^{①②},但相关内容十分简略,无法满足城市规划科学认识的内在需要。本文在广泛查阅一批原始档案资料

的基础上,试就此问题作一初步的专门探讨。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文教区规划概况

1. 北京文教区规划的由来

所谓文教区,即文化教育区或高等学校区,又简称学校区、学院区或高校区等,是某个城市中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分布比较密集,以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片区。北京的文教区规划问题,最早是由来华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首先提出的。

1949年9—11月,首批苏联市政专家团援助北京的市政建设,为了北京更长远健康发展,建筑专家М·Г·巴兰尼克夫(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规划纲要性质的建议。在城市功能分区方面,他建议将高等教育区选择在“业经配有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一带,“可占用土地面积四五平方公里,建设高等专门学校、工业学校和党政学校”,其主要依据是“位置是在行政区和休养区的中间,可给这个区域建立便利的交通,地势高而清净,有面积很大足够应

用的绿地,在条件上来讲是适宜建立学校的一个区域”^③。

新中国刚成立时,北京市域范围还相对比较狭小(总面积约1225km²),巴兰尼克夫所提出的功能分区建议体现出了跳出北京老城进行城乡整体规划的全域规划思想,所划定文教区的面积与北京老城大致相当(图1),当时在其范围内主要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个别高校及少量基地设施,大部分为农田风貌。

2. 文教区规划的专题研究与讨论

1951年3月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都委会”)正式开始北京文教区的规划设计工作,4月26日曾邀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科学院、卫生部及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座谈过一次,初步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此后规划工作者对文教区规划作了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1951年10月20日下午,北京都委会召集企划处和道路系统专门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共20余人,对文教区规划有关事宜进行了专门讨论。这次会议由北京都委会道路专家林治远担任主席,他首先报告了有关背景情况,之后由企划处处长陈占

祥报告了文教区规划的设计原则,林超教授报告了文教区土地使用调查情况,樊书培报告了文教区规划设计的说明,继而都委会副主任梁思成讲话,与会专家就文教区规划设计原则、设计标准、道路系统、园林和河湖系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④。

1951年10月提交讨论的文教区规划方案,总面积约83.85km²,紧贴北京老城于西北方向布局,通过西直门、德胜门及新街口以北的城墙豁口与老城联系,当时已确定建设的有人民大学等15个单位,另有北京大学等19个单位的建设计划待定(土地尚未划拨)。规划方案确定以海淀镇(图中标“海甸”)为文教区中心,发展其公共服务功能,各个学校依理工、文法、艺术等性质的不同予以相对集中(图2),为了生活及工作上的需要及市政设施的便利,把各单位的工作部分和生活部分分别集中起来,互相靠近,并将一些可能的服务机构如小学、托儿所、诊疗室、合作社等统一设立。规划保留现状大片水田,以长河、清河沿岸、圆明园及西郊公园为主要的绿地,并以西苑操场为基础向南发展规划了全国运动场。

经讨论,与会专家认同规划人员提出的文教区规划应富有弹性的原则,并希望保留绿地面积再增多些(绿地保留比率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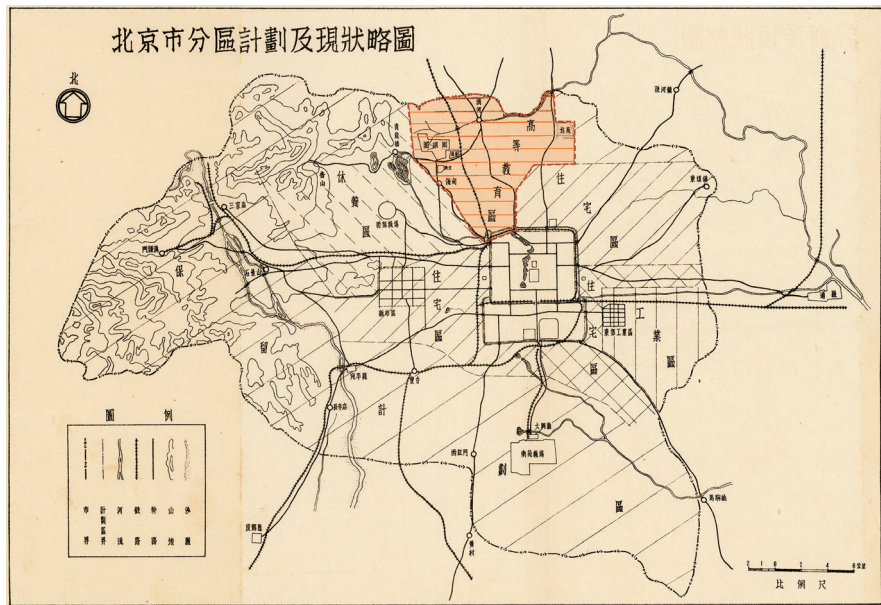


图1：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北京市分区计划及现状略图”（1949年11月）
注：图中“高等教育区”的颜色为笔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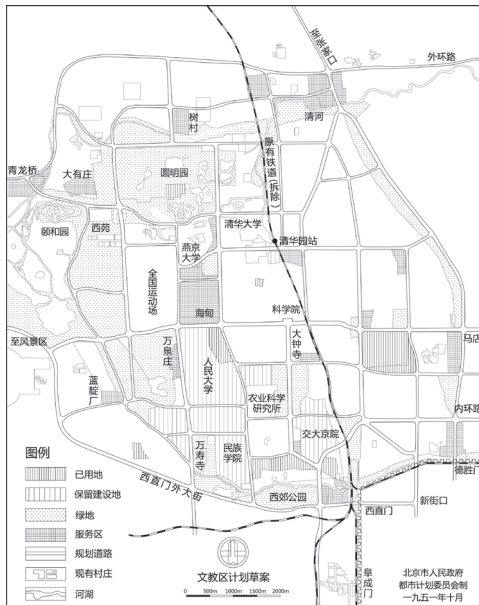


图2：北京文教区规划方案（1951年）
注：根据档案资料重绘。

加为 50%~60%，其中含道路面积）；关于道路系统则提出“就方格式道路系统中，建议斟酌增加放射路（以海甸为中心向城区及各较大的小中心采用放射式道路），两者混合利用”^⑤。

这次讨论会后不久，1951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 26 个单位商讨文教区建筑用地问题，会上北京市副市长报告了文教区一年来发展的情况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北京都委会介绍了文教区计划草案及高等学校用地的暂行标准，并决定邀请相关方面专家组成一个关于文教区土地使用的小组来研究文教区的建设，以便更好地互相配合，有计划地发展^⑥。

之后，北京文教区规划又作了进一步修订。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文教区的中心由海淀镇调整为中国科学院。“开始时我们考虑以海甸〔淀〕为文教区的中心，主要通道都由各处向海甸〔淀〕集中。但经讨论研究认为在政治意义上及文教区的本质上，文教区应以科学院为中心，并以主要通道使它和其他地区密切联系起来，尤其是将来本市总车站、飞机场及行政区等。科学院的中心意义也应在体型环境的处理上明确地表示出来。科学院的位置和在他面前的主要通道，在地理及地形上讲

是完全处在中心地位，作为文教区的中心，是可以肯定的，在科学院的周围、目前有清华燕京人大等，将来有北大师大矿院等，是完全可以起领导作用。”^⑦

与文教区中心位置密切相关的，还有文教区路网结构的重大变化——1952 年以后的文教区规划自西直门往西北方向设计了一条通向清华大学方向的放射线（图 3），这一设计处理是对 1951 年 10 月专家讨论意见“建议斟酌增加放射路”的积极响应，使文教区规划方案有了明确的轴线和统率性秩序。北京文教区规划的修改与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也有重要联系，在 1953 年春北京城市规划甲、乙方案和 1953 年底第一版总规方案中，其西北方向的放射线均为北京文教区的中轴线。然而，北京文教区规划的这一设计调整，也使文教区内各个院校和研究单位的建筑规划布局（南北朝向）与西北—东南方向的轴线产生了重大而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容下文讨论）。

3. 1953 年第一版北京总规中关于文教区规划的定位

1953 年下半年，由中共北京市委畅观楼规划小组完成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

使文教区规划得以初步定案。该版规划要点中明确“西北部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所在地区，以科学院为中心发展为文教区”，“从东直门、西直门、菜市口、蒜市口向外开辟四条放射干路，分别直达东北部工业区和民航机场并通往古北口、文教区及休养区、丰台及良乡、东南部工业区并通往天津，其宽度均应不少于七十公尺”^⑧（图 4）。

二、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关于文教区规划的“分歧”及其实质所在

1. 国家计委对北京文教区规划的不同意见

第一版北京总规成果于 1953 年底上报中央后，中央批交国家计委审查研究。国家计委于 1954 年 10 月 16 日向中央呈交报告，在明确“建议中央原则上批准北京市委所拟的规划草案”的同时，提出了 4 个方面的不同意见，主要涉及首都工业建设、首都人口规模、道路宽度和绿地等规划标准以及文教区规划等。其中关于文教区规划的内容如下：

关于北京市的区域划分：

北京市所拟城市区划，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其中“文教区”还值



图 3：北京文教区规划示意（1953 年修改方案）
注：左下角为 1951 年的文教区规划方案。



图 4：“北京市规划草图——道路宽度”局部放大（1953 年 11 月 27 日）

得考虑。城市中的学校,除有些专门学校可靠近性质相近的工业企业外,原则上应有计划地分布在居住区内。其好处是:(1)便于利用城市的住宅及各种公共设施,至少部分本市师生员工可回家食宿,因此可以少建一些房屋,如果远离城市,即需要多修建宿舍,同时自来水、下水道、道路、交通车辆和其他公用设施也都要相应的增建,这就增加了国家的投资;(2)学校建筑物一般是较好的,摆在居住区内可增加城市的美观;(3)学生便于接近社会文化,容易提高其教学效果;(4)青年学生在居住区内可以活跃城市的生活;(5)便于学生实习和利用企业、机关、团体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学校里讲课,以解决教授不足的困难,并可利用学校的师资和设备举办夜大学以便利职工居民提高文化等。

因此,我们建议北京市可不再设置单独的“文教区”,至少可以不设集中过多学校的大文教区,现有的文教区除已有的学校仍可按原定计划进行建设外,再增添新的学校时,可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分布在居住区内或靠近性质相近的工厂。该区内的空地,可布置一些住宅、公共建筑或卫生上无害、运输量小的中小型工厂。^⑨

国家计委的上述意见,较大篇幅是在阐述不设“文教区”而把有关学校有计划地分布在居住区内的5大优点,进而明确“建议北京市可不再设置单独的‘文教区’”,并退一步指出“至少可以不设集中过多学校的大文教区”。其后的一些文字则是对现有文教区建设的改进措施。

2. 北京市对文教区规划的基本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1954年10月,在1953年版总规向中央呈报后迟迟未获批复的情况下,中共北京市委于10月24日向中央再次呈报了修订后的规划草案,所附《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几项修改和补充的说明》(以下以“《规划修改说明》”代称)中指出:“近

来有些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提出城市中是否应单独设立文教区的问题,这些同志认为:高等学校离开市中心区单独建立,会使青年脱离了社会活动,生活上也感到不便,并且不能利用质量较好的高等学校建筑来丰富城市的建筑艺术。我们对于这个理论问题,极其缺乏研究。但北京的西北部原来已有了清华和燕京,一九五三年又有八个高等院校开始在那里建设(这些学校用地面积都很大,在城内是找不到这样大的空地的,在城外建设,集中起来又较为经济),在制定这个规划草案时,已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⑩这表明,当时北京文教区规划已经引发争议,而北京市也十分清楚,但对于当时的城市规划工作而言,文教区的建设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规划工作者只能作为现状条件予以考虑。

对于文教区的规划设计,北京市在《规划修改说明》中提出:“‘文教区’应是整个居住区(即机关、学校和住宅用地)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的文教区除了已设的高等学校以外,凡可不集中在那里建设者,均可不去。现有高等学校,尤其是那些用地并不是很多的院校,凡在城内能够找到适当地点进行建设者,仍可在城内建设。在其他的居住区内,甚至工业区内,也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设置一些高等学校或专科学校。在现在的文教区内也应有相当的社会文化福利设施和比较集中的住宅区。”不仅如此,该说明中还介绍了对文教区规划的修改情况:“根据这种情况,这次对文教区的范围适当缩小一些,原规划五十五平方公里,现改为四十三平方公里多。现在在文教区的高等院校的部分住宅,必要时可以建在附近一般的居住区内。”^⑪

3. 对比分析

对比以上国家计委审查意见和北京市《规划修改说明》中有关文教区规划的内容表述,不难发现,两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基本一致的:都承认单独的文教区建设

存在某些缺陷,都认可文教区建设的基本现状,而城市规划工作的应对思路也大致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在1954年底前后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关于首都规划的四大争论问题中,文教区规划其实算不上一个重大分歧问题,双方的态度反而是基本一致的。

由上分析可见,在国家计委对北京第一版总规提出的四点意见中,之所以对文教区规划问题持有异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在首都规划工作方面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在1954年10月,双方都急于直接向中央呈送有关报告文件、未作必要的相互沟通,因而造成了一定的误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北京市在收到国家计委的审查意见后,经专门研究讨论于1954年12月18日向中央呈报的《北京市委对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北京市规划草案的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未再就文教区规划问题提出异议。

三、北京文教区受批判的风波(1955—1957年)及其后续发展

由于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在文教区规划问题上并无重大分歧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未再就此问题产生争论。然而在社会舆论方面,自1955年起却掀起了一股对北京文教区批判的风潮。1955年4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一篇题为《追求形式的恶果》的文章中报道:“矿业学院在去年建设起来的一幢教学大楼,按照原设计者原来的宏图是:‘它要负起改变文教区面貌的重大任务’。结果这幢建筑由于追求形式,不仅使用起来不方便,而且浪费了很多资金。”文章指出:“建设高等学校需要巨额投资。当目前国家正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节约地使用国家所交给我们的这项文教建设资金,使它发挥投资的最大效果。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文教建设单位和建筑设计部门都很好地重视节约,在建设中还存在着很大的浪费现象。”^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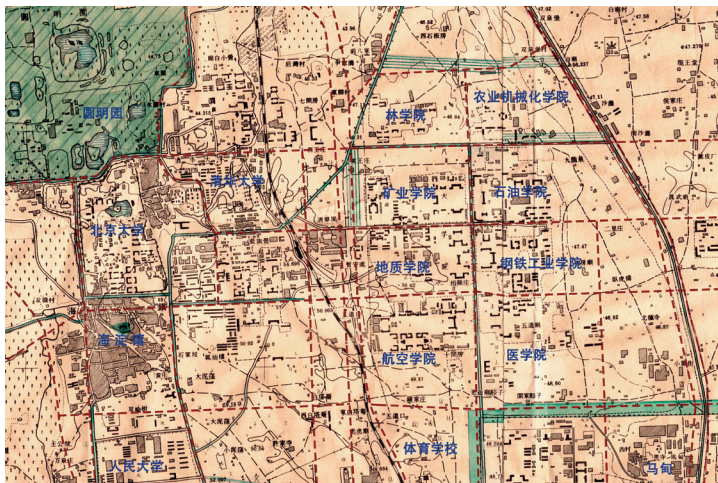


图 5: 北京文教区 1959 年建设现状示意图 (局部)

注: 红色虚线为 1959 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路网。底图取自 1963 年 5 月“北京市绿地现状图”, 其地形图于 1958 年绘制。



图 6: 1959 年 9 月印制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图之局部——中国科学院及部分高等院校的位置示意

如果说以上批判主要针对北京文教区中的个别学校, 那么到 1957 年, 批判对象就完全是文教区本身了。1957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长篇报道《谈城市建设中的“文教区”》, 文章以大量实例阐述了远离市区建立文教区的种种弊端:“脱离城市现有的市政建设, 一切得从头搞起, 在国家财政上增加了很大的额外负担”;“给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 使学校俨然如同一个文化孤岛, 对学生的教育是不利的”;“把学校建立在远离市区的文教区内, 使本地的学生不能走读”;“增加了高等学校举办夜大学的困难, 并使学校不能充分发挥提高附近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的作用”;“增加了学校师生在生活上的许多困难”;等等。进而总结指出:“建立文教区违反了两条重要的原则, 即节约建校的原则和学校教育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践、师生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原则。”^⑨

尽管北京的文教区一度受到批判, 但由于它早已成为北京城市建设的现状条件 (图 5), 因而在 1954 年以后的历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依然是重要的规划内容。图 6 是 1959 年 9 月印制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图的局部, 图中中国科学院的位置已调整至北中轴的显要位置, 除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外,“八大学院”(林业学

院、农业机械化学学校、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和北京医学院) 因整齐排列布局而最为瞩目, 另外还有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铁道学院、农业大学、体育学院以及不少未在图中标注名称的学校。这些文化教育和科研单位自 1950 年代开始部分建成并逐步投入使用, 后来又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 依托北京西北部密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科学院早期选址地点——中关村 (原名“中官屯”) 出现了“电子一条街”, 1988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99 年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园区除拥有 40 多所高等院校以外, 还有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国家 (市) 科研院所 200 余所, 建立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百余个, 于 2009 年经国务院批复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四、进一步的讨论: 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响应关系

上文对北京文教区规划建设情况作了概要回顾, 基于本文主题, 让我们回到对文教区规划问题的讨论。一个基本的疑问在于: 在 1954 年前后, 北京文教区规划

问题因何会产生争论? 对于之后的文教区批判又当如何认识和评价?

1. 关于北京文教区规划的学术理论分歧

反观北京市 1954 年 10 月向中央报告的《规划修改说明》, 关于文教区规划, 一开始便谈及“近来有些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提出城市中是否应单独设立文教区的问题……”, 这提供出一个明确线索。在“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中, 来华从事技术援助活动的苏联专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们对城市规划某些问题的认识和倾向甚至主导着规划工作的走向。继 1949 年首批市政专家团之后, 对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主要是 A·C·穆欣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Мухин)。穆欣于 1952 年 3 月底来华, 1953 年 9 月底前后返回苏联。作为一个比较注重城市规划理论性和思想性的苏联专家, 穆欣对北京的文教区规划持赞成态度。1952 年 12 月 22 日, 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穆欣同志看了我们百十种建筑设计图和都市规划图, 每看过一张他都要问:‘它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拿北京的文教区来说吧, 我们最初的计划虽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 但在道路系统上未能充分表现科学院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设计者思想不明确的表现。

经过他的帮助，我们把它修正了。”^⑭1953年9月25日，穆欣临回国前在上海所作的城市规划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在苏联，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尽可能靠近一些，主要因师资缺乏，为免兼课教授往返奔走，浪费精力与时间，因此最好能使各学校比较集中。”^⑮

作为穆欣的接替者，苏联专家Д·Д·巴拉金（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рагин）于1953年5月底来华，由于他长期供职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城市设计院并指导具体规划业务工作（任总工程师），这使他在技术援助活动中更加注重城市规划的现实性。在文教区规划问题上，“穆欣专家与巴拉金专家意见不一致”^⑯。在穆欣于1953年9月底前后返回苏联后，中国城市规划工作中，巴拉金的态度和倾向开始发挥主导性的作用。1954年4月指导太原市规划工作时，巴拉金即曾明确指出：“今后不要再修建集中的文教区，集中搞文教区没有什么好处，文教区的建筑分散在住宅区内，能使住宅区更生动起来。”^⑰

由此可以理解，1954年10月国家计委对北京文教区规划的不同意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苏联专家在这一理论问题上学术观点的分歧，以及由之对中国城市规划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而苏联专家对文教区规划的不同意见，不只针对北京市，在西安、太原和杭州等市的规划工作中也多有体现。1956年前后的《西安市规划工作情况汇报》中记载：“赞成划分文教区的理由是：（1）学校集中，管理方便；（2）学校集中，某些设施（运动场、礼堂〔等〕）利用率高；（3）学校集中，先生〔教师〕兼课方便；（4）环境安静”；“反对的理由是：（1）学校集中，使学生脱离社会生活；（2）学校距住宅较远，学生上课不方便；（3）学校分散在干道〔旁〕或街坊内，可丰富市容；（4）某些专叶〔业〕学校可接近实习地点”。该档案中还记载了巴拉金对西安市文教区规划的意见：“巴拉金专家建议，已经形成的不动，将来建设的则分散处理。”^⑱这表明，在规划理论付诸实践

的过程中，专家学者的意见分歧影响到了规划理论的贯彻执行。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而将1954年前后关于北京文教区规划产生分歧意见的原因归结为主要受到苏联专家巴拉金较为个人化的学术影响呢？当然不能如此简单而论。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北京的文教区规划设计方案本身就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最显著者即由1951年10月文教区规划研讨时的专家意见所引导，后在1953年版北京总规方案中予以呼应的自西直门向西北插入文教区的放射线，这一设计处理固然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及文教区规划增添了艺术性，但却对文教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布局产生了地块畸形、房屋朝向不佳等重大妨害（图3），正因如此，在1955年以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最终取消了这条西北方向的放射线（图6）。换言之，规划设计方案的不成熟也影响到了文教区规划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以及对其的科学评价。

更进一步分析，在苏联专家学术分歧的背后，还有北京文教区建设至关重要的现实性因素，它们对规划理论的实践应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反作用。

2. 城市建设实践对规划理论的反作用力

作为首都科研院所的集中地，北京文教区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兴建的一批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科学研究机构，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之外，广为人知的即上文述及的“八大院校”（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这些学校的建设规模都相当庞大（40~60hm²左右），其建设活动备受瞩目，而各单位在当时的长远发展计划及远景规模却并不清晰，致使各单位在向规划部门申请用地及规划部门拨地的过程中多有争论，由此产生诸多的建设矛盾。

实际上，自北京文教区规划工作一开

始，各个建设单位缺乏明确的长远计划，“各自为政”建设思想主导等问题就十分突出。以早在1951年10月20日召开的文教区规划研讨会为例，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在关于文教区设计原则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在着手设计和各用地单位筹备建设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计有：（一）各用地单位要求拨给土地面积过大，都希望能在其本单位使用土地面积内建筑所需要的一切建筑物，包括由托儿所一直到高等学校及一切必要的附属设备，几乎可以解决每一个人可以从出生到老死的一切问题，这样的要求，对有限土地的使用分配上便造成了困难。（二）各用地单位（主要是各大学与专科学校）人员数目都不能确定，有的前后申请的预期人员数目相差达数千之巨，因之在核拨土地标准时，也有困难……”^⑲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当时的文教区规划才确定了“要有弹性”和“在全区内保留较多的绿地带”等基本设计原则，而这样一些原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则反过来又“促进”了文教区内各建设单位建筑和设施分布的分散化及混乱无序。

就文教区建设而言，还应当注意到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时代条件，各个高校在房屋和市政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等多方面的种种困难，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北京文教区在建设初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大量占地、建设散乱、配套不足等市容面貌，各方面人士对它有所非议或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由于北京文教区建设各方面实际问题的存在，教育、建设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发展及影响，到1954年时，国家计委对北京文教区规划提出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它绝非简单的由苏联专家学术分歧问题所造成。

再就1955年开始的对北京文教区的批判而言，应当注意到，有关的一些批评之词针对的主要都是文教区范围内的一些具体“建设”活动，这与“文教区规划”显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因此，不能由于1955—1957年间对北京文教区某些

“建设”行为进行批判的存在,而将北京文教区规划简单理解为一项完全负面的工作。立足城市规划专业的视角,北京文教区规划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得以实现了的。

3. 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响应关系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通过本文的历史考察,对于规划理论与实践响应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迪。作为城市功能分区思想的具体落实内容,文教区规划理论在向社会实践方面付诸建设实施和转化的过程中,除了受到所在城市的建设基础、发展条件和总体规划方面的制约之外,在微观层面还受到文教区内部为数众多的各个建设单位在发展计划以及财政、技术和施工水平等建设能力方面的牵制,在宏观方面则必然受到整个国家在社会发展、政治运动等时代条件和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影响规划决策的一些权威专家的不同学术理论见解也不容小觑,因此是一个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早期的规划理论、规划设想或规划原则,到最终的建设结果,必然要出现诸多的调整、修改和变化,这一过程本身也是规划理论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的过程,即便出现一些偏离早期设想的情况,也都是正常的现象,并无可厚非。规划理论对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的发挥在客观上决定了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两者的地位不可能是对等的,规划理论必然高于规划实践、超脱于规划实践,两者必然是有“距离”的。而规划实践对规划理论的响应,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或具体落实性质的,规划实践也具有一定的、能动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使得规划理论通过各种实践要素的检验,具有了新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从而在城市建设活动中得到实际的应用和转化。

正是由于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的这种辩证统一的响应逻辑和内在关系,北

京文教区规划作为城市功能分区思想的一个具体载体,它对于城市建设发展而言是否科学合理,还应当更多地回归到规划理论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评价。就此而言,70多年来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基本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在于,正是有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区规划,才有了首都各项教育、文化和科学研究资源在西北部地区的集中布局,才催生和孵化出诸多的创新思想、科学技术方法和产品,才最终成就了今天的首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科技园。在这个意义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教区规划为北京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应当予以积极的承认。而中关村科技园作为北京文教区规划的产物,也是值得更进一步研究与探索的首都规划遗产。

五、延伸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北京的文教区规划,是一个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规划案例,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正是在北京文教区规划建设的带动下,西安在古城外的南郊建设了文教区,兰州在黄河北岸的安宁区建设了文教区,杭州在西北郊建设了文教区,沈阳在市区北部和南部建设了北陵和南湖两个文教区……1957年5月9日,第三批来华苏联规划专家组组长C·A·勃得列夫(С.А. Болдырев)在杭州指导规划工作时指出:“在中国二〔两〕年工作〔期间〕,发现中国很多城市有文教区。”^{②0}1959年2月,建筑工程部城市设计院在一份总结材料中也曾指出:“由于新中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几乎所有城市都建成了文教区。”^{②1}

那么,如此影响深远的文教区规划,究竟是何思想来源?它是现代教育理念的产物,还是基于特殊政治文化条件下管理思想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专家勃得列夫1957年在杭州讲话时曾针对文教区建设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研究不透,而在莫斯科不是这样

的。可能是教授缺人、共同使用?把学生与家庭分开是否合适呢?我还没有研究好,还不敢提出原则性的意见。”^{②2}这表明,文教区规划在苏联并不流行,还谈不上是苏联城市规划的重要经验。无疑,1949年来华的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是北京文教区规划的始作俑者,让我们再看他关于文教区规划的依据——“位置是在行政区和休养区的中间,可给这个区域建立便利的交通,地势高而清静,有面积很大足够应用的绿地,在条件上来讲是适宜建立学校的一个区域”^{②3}。显然,这些依据主要是从城市土地使用角度作出的一些考量,若从思想来源分析,恐怕只能追踪到国际上1933年《雅典宪章》(城市规划大纲)所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传播的影响,而谈不上什么现代教育理念。可以推想,巴兰尼克夫1949年9—11月在北京调研时,曾了解到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形势,以及一些高校面临选址建设的现实诉求,他根据规划工作经验从城市用地分析的角度建议将高等学校布局在西北部,如此而已。巴兰尼克夫的这一建议,只是城市宏观布局层面的一个粗略概念,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或偶然性。而文教区建设在中国众多城市的流行,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规划工作者对巴兰尼克夫建议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推动力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社会背景。1953年4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一篇题为《北京的春天》的通讯中写道:“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五年计划激动着北京的人心……北京市的基本建设在加紧进行……这里是工厂区,未来的纺织厂将在这里开工……这里是文教区。沿着林荫大道,沿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马列学院将构成以科学院为中心的文教城。更多的大学和学院将在这里设立,其中有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医学院……未来的文教城将比现有的北京城大三分之一……”^{②4}

可以说,文教区作为一个新概念、新理论或新事物,其规划建设本身赋予了人们以畅想美好未来生活的丰富图景,而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文教区规划的建议,就好似给北京这座城市施了魔法一样。与其说文教区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特殊时代条件下新的社会思想的产物,城市规划只是起到了触媒作用而已。

反观 1955—1957 年对文教区建设的批判,核心问题主要是建设节约和学生脱离社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深入讨论起来又都是相当复杂的。1957 年 3 月,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 1957 年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说明文件中指出:“在 1952 年至 1953 年间要兴建十六个高等学校,每个学校的用地都在五、六百亩甚至上千亩,仅钢铁学院、矿业学院等十大学院总共用地就达九千亩,相当于北京城的十分之一,要想把这些学校都放在城里,那就要拆除十多万间平房,很显然,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学院当时还要靠清华大学支援,要尽可能接近清华;当时的条件下,决定了在城外的西北部修建。现在看来,这种安排基本上是合理的,并没有因此造成市政设施上的很大浪费。”“至于说因为学校在城外,就会使学生脱离了社会生活,使学校俨然如同一个孤岛,也值得研究。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在于城内城外。城外同样可以接近工人和农民。”^{②5}实际上,文教区作为城市功能分区之一,本身就是城市的一部分,所谓文教区在城外或远离城市的说法,本身就反映出城市认知观念的狭隘。关于文教区建设的批判风波,只是北京这座传统都城在其现代化转型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片段或插曲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教区相关功能与设施的不断完善,批判文教区的声音也就自然消失了。审视今天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西北部高校和科研机构云集,科技创新氛围浓郁,宏观层面上的城市功能布局还是相当合理的,它是首都北京鲜明的

城市特色之一。这一点,也正是今天来回顾北京文教区规划历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指导意见。]

注释

- ① 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R]. 1987: 1-14.
- ② 董光器. 四十七年光辉的历程——建国以来北京城市规划的发展[J]. 北京规划建设, 1996 (5): 5-8.
- ③ 巴兰尼克夫. 苏联专家[巴]兰尼[尼]克夫关于北京将来发展计划的报告[Z]. 岂文彬, 译.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001-009-00056, 1949: 6.
- ④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北京市文教区计划草案[Z].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档号: C3-79-1, 1951: 1-18.
- ⑤ 同④.
- ⑥ 北京市新闻处. 北京市人民政府邀集有关单位商定使用文教区土地办法, 加强各单位建筑的计划性[N]. 人民日报, 1951-12-02 (1).
- ⑦ 同④.
- ⑧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三年)[R]. 1954: 46-52.
- ⑨ 国家计委. 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的报告[Z]. 中央档案馆, 档案号: 150-2-131-2, 1954.
- ⑩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四年下半年)[R]. 1955: 92-97.
- ⑪ 同⑩.
- ⑫ 马浩然. 追求形式的恶果[N]. 人民日报, 1955-04-19 (2).
- ⑬ 方玄初, 王纯亨, 黄金章. 谈城市建设中的“文教区”[N]. 人民日报, 1957-01-11 (2).
- ⑭ 梁思成. 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思想[N]. 人民日报, 1952-12-22 (3).
- ⑮ 上海市城建委. 穆欣同志关于上海市城市规划的报告[Z].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档号: 102-2-26, 1953: 20.
- ⑯ 太原规划小组. 巴拉金专家对太原城市规划工作小组汇报意见[Z]. 城市建设部档案. 中央档案馆, 案卷号: 259-1-31: 10, 1954: 6.
- ⑰ 同⑯.
- ⑱ 西安市城建局. 西安市规划工作情况汇报[Z]// 1953-1956 年西安市城市规划总结及专家建议汇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946, 1956: 206.
- ⑲ 同④.
- ⑳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苏联专家组在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专家谈话纪要(621)[Z].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案卷号:

C3-00103-1, 1957: 102.

- ㉑ 建筑工程部城市设计院办公室. 十年来城市建设“第二、三部分提纲”(第三次稿)[Z].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图书馆, 档号: AK19, 1959: 7.
- ㉒ 同⑲.
- ㉓ 同③.
- ㉔ 金凤. 北京的春天[N]. 人民日报, 1953-04-19 (6).
- ㉕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说明(四稿)[R].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档案, 1957: 13-14.

参考文献

- [1] 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R]. 1987: 1-14.
- [2]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说明(四稿)[R].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档案, 1957: 13-14.
- [3]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北京市文教区计划草案[Z].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档号: C3-79-1, 1951: 1-18.
- [4] 北京市新闻处. 北京市人民政府邀集有关单位商定使用文教区土地办法, 加强各单位建筑的计划性[N]. 人民日报, 1951-12-02 (1).
- [5] 董光器. 四十七年光辉的历程——建国以来北京城市规划的发展[J]. 北京规划建设, 1996 (5): 5-8.
- [6] 方玄初, 王纯亨, 黄金章. 谈城市建设中的“文教区”[N]. 人民日报, 1957-01-11 (2).
- [7] 国家计委. 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的报告[Z]. 中央档案馆, 档案号: 150-2-131-2, 1954.
- [8] 李浩. 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
- [9] 马浩然. 追求形式的恶果[N]. 人民日报, 1955-04-19 (2).
- [10]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三年)[R]. 1954: 46-52.

图片来源

- 图 1: 巴兰尼克夫. 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单行本)“图一”[Z]. 北京市建设局编印, 1949.
- 图 2、图 3: 北京都委会. 文教区计划草案[Z].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档号: C3-79-2, 1951.
- 图 4: 畅观楼规划小组. 北京市规划草图——道路宽度[Z].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档号: C1-47-1, 1953.
- 图 5: 国家计委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绿地现状图[Z].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327, 1963.
- 图 6: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Z].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档案, 1959.